

第陸章 結論

在中共的認知中，「安全觀」是一國對國際安全的主觀認知，也是制定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於安全的認知也有所不同，「安全觀」的內涵勢必有所調整。面對冷戰後國際安全環境好轉與國際格局將朝向「多極化」的認知下，中共調整以往以軍事安全為重的傳統安全觀，在延續鄧小平時期確立的「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下，將經濟安全列為國家利益的重心，全力發展國家現代化建設。而為保障周邊環境的穩定以利「四化」的順利發展，中共在「新安全觀」中納入亞太各國提倡的「合作安全」理念，一方面在主張通過對話增進信任，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領土爭端與國家間爭議問題之下，提高中共與亞太國家的相互信任，減少因相互猜忌而導致的小規模地區衝突，塑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此外，藉由互利合作，也有助於中共獲取經濟發展的資金、技術與國防現代化所需之高科技武器，縮小與其他大國間的實力差距，提升綜合國力。可見，「新安全觀」中包含(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思維，兩者互為體用。中共雖然接受「合作安全」的理念，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並提升國家間的互利合作，但在涉及現實主義主張的國家主權、安全等問題時，中共仍堅持其立場，採取強硬態度。而在視「和平」為「發展」的前提之下，與各國交好、穩定周邊環境以提升綜合國力的概念基本上仍屬於「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傳統思維，將「安全」與「實力」掛鉤，使得「合作安全」成為中共換取安全環境的策略運用。¹ 在外交政策方面，雖然中共呼籲各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在基於(新)現實主義下，認知大國關係主導國際衝突與合作的走向，即明顯偏重「大國外交」在雙邊外交中的重要性，並突出聯合國安理會的主導作用。而為「多極化」國際格局的實現，中共除了提升綜合國力之外，「新安全觀」也成為中共在國際場合提倡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提升國際地位的利器。

不過，周邊安全環境並未如中共預期。除了美國在東面的駐軍尚未撤離，作為戰略後盾的西部疆域，卻在西方國家以北約作為前進中亞的突破口之下，喪失戰略緩衝區。雖然未將中亞國家正式納入北約成員，但是藉由北約「新戰

¹ 于有慧，後冷戰時代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民國90年2月，頁68-69。

略」賦予的政治功能，將職權範圍擴大到非會員國，以便處理危機與進行維持和平行動，因此將中亞國家納入北約外圍組織「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以及「和平夥伴關係」計劃，發展政治、軍事合作。中共不僅憂慮北約藉由軍事合作、演習，將西方軍事力量部署至中亞，危及中國大陸西部邊界安全；政治方面，北約在配合美國全球民主化的戰略下，向中亞輸入西方價值觀，導致中共與中亞各國在社會制度與意識型態差異增大；經濟方面，由於北約以確保盟國石油運輸線路的安全作為首要任務，因此也將對中共與中亞國家的能源合作構成阻礙。而在 1999 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後，北約擴展對中共的衝擊已不限於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依中共的解讀，北約擴展是在美國主導下形成，是美國建立單極霸權的工具。藉由「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將合作範圍伸入中亞，直逼中國大陸的西部邊疆，並在東側配合《美日安保條約》，意圖圍堵中共。因此，中共為因應北約擴展形成的政治、軍事、經濟衝擊，基於「新安全觀」指導下的雙邊與多邊外交政策，在加大與中亞各國、俄羅斯之間的雙邊合作之外，並積極促成「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以多邊合作框架擴大區域合作，提升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而為反圍堵，中共在拓展雙邊關係之外，更積極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藉由在國際場合大力倡導「新安全觀」，強烈抨擊北約擴展以及美國擴張軍事同盟的做法是為冷戰思維，不符合冷戰後以和平、協商處理國際爭端的形式，進而突顯「新安全觀」強調「互信、互利、平等、協作」以及「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特質，不僅有助於提升中共之國際地位，在極力呼籲各國摒棄冷戰思維、倡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之下，可見其抗衡美國建立單極霸權之意。

在中共大使館遭到北約轟炸，引發中共國內對於全盤國際戰略、「和平與發展」、「韜光養晦」、對美「不搞對抗」綱領的強烈質疑，各種反西化、反全球化、反對私有化市場改革的「左傾」勢力，大有與民族主義情緒結合，挑戰冷戰後整體外交方針的趨勢。² 在認知冷戰思維依然存在，對於未來安全環境表示悲觀下，中共因此修正其原有之外交政策，調整「新安全觀」中的安全利益重心。在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受北約轟炸後，中共中央軍委、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即刻表明，解放軍堅決擁護政府、努力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堅

² 張登及，《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之研究——理論與實踐的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1 年 7 月），頁 114。

決保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受侵犯的嚴正聲明。³ 繼 8 月北戴河會議期間，中共高層作出增加軍費的決議後，10 月便同意增撥 8 百億人民幣作為強化三軍防衛反擊能力之用，顯見中共提高軍事安全的比重。而由中共因應北約擴展的外交政策中可見，為抗衡北約在中亞地區的軍事勢力，中共積極與中亞國家、俄羅斯拓展雙邊與多邊的軍事合作。其中由於中俄雙方具備反制北約擴展的共同利益，因而在 1999 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後，雙方軍事合作更形密切，提升至戰略層級。同年 6 月中共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訪問俄羅斯之際，雙方便達成多項軍事合作計劃，俄同意向中共輸入多項高科技軍事裝備。此外，中共軍方高層亦密集穿梭於以色列等武器製造國間，可見中共欲加強戰備，加速武器升級的企圖。⁴

顯然，北約擴展已令中共倍感威脅。雖然基於「新安全觀」中的「合作安全」理念，主張藉由多邊安全對話、提升聯合國與安理會在維護國際安全事務中的主導作用以處理冷戰後的地區衝突，但北約等軍事同盟不但未遭到廢除，反而更形擴張。1999 年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逕自出兵南斯拉夫，已令身為聯合國安理會一員的中俄兩國，大感地位遭致消弱。在自覺遭受圍堵的情勢下，加速武器更新、提升戰備的舉動，可見軍事安全對中共的重要性並未遜於經濟安全，反而更形突顯中共「新安全觀」的策略性。在深感聯合國的地位弱化，柔性訴求國際社會摒棄「冷戰思維」、倡導「新安全觀」的作為，已淪為宣示性口號之下，為因應外來的威脅危及國家安全，中共積極擴張軍備的行為可謂(新)現實主義理論下，「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傳統思維，無怪乎外界對「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建立以及《中俄睦鄰友好條約》之簽署，有謂「同盟」之疑慮。

而有鑒於去年布拉格高峰會，北約通過第五次東擴計劃，將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凡尼亞、斯洛伐克等前東歐共產國家正式納入會員國，並為有效打擊恐怖主義，宣言中指出北約必須能派部隊到任何需要的地區，包括可能遭受核生化武器威脅與傳統歐洲戰場之外地區。可見，在美國總統布希矢志將北約轉型成為對抗恐怖主義的角色下，不僅令北

³ 《聯合報》，民國 88 年 5 月 12 日，第 3 版。

⁴ 于有慧，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中國大陸研究》，民國 89 年 6 月，頁 10-12。

約的擴編行動加速進行，為配合反恐，北約在中亞地區的安全合作，也將更形深化。雖然藉由反恐，打擊塔利班勢力、掃蕩中亞地區的「三股勢力」是中共所樂見的，總部設於阿富汗的新疆分離運動組織「東土耳其伊斯蘭運動」(簡稱東突)在美國的同意下，已於 2002 年 9 月 12 日正式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中，⁵ 但中共對於美國與北約藉由反恐，長期駐紮在中亞地區的意圖深感不安。⁶ 據報導指出，為減緩西方勢力大量進駐，衝擊中亞地區的大國關係，令「上海合作組織」呈現空心化的負面衝擊，中共因而積極展開睦鄰外交，不僅與中亞國家召開反恐會議，並造訪緬甸、越南、哈薩克、蒙古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倡言區域合作。⁷

由是，隨著反恐任務的持續，提供美國與北約在中亞地區獲得長期駐守的正當性，將西方軍事勢力直逼中國大陸西部疆域，令中共倍感威脅。因此，在認知 911 事件後，周邊安全環境不確定性增大，西面(中亞)危機不斷，亂局將呈現長期化趨勢之下，⁸ 「新安全觀」意涵中基於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合作安全」理念將不斷遭受挑戰，而中共一再強調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不結盟」原則，則成為中共因應北約擴展，提升綜合國力、換取安全環境的策略運用。

⁵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指出，「東突」與賓拉登過從甚密，在境外建立基地、培訓恐怖份子，並派人潛回境內，策劃、指揮與實施恐怖破壞活動，例如 1998 年 5 月烏魯木齊爆炸案以及 1999 年 3 月新疆和田爆炸案。中共估計，該組織策劃下的一系列爆炸、恐怖攻擊、暗殺活動已造成 166 人死亡，440 多人受傷。《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9 月 13 日，第 11 版。

⁶ 除了深怕遭致西方國家的戰略圍堵外，中美在反恐行動中也產生歧見。不僅布希在上海參加亞太經合會時指出，反恐絕對不能作為鎮壓少數民族的借口，對於中共利用反恐機會打擊新疆政治異議分子與宗教分子的做法不以為然外；中共對於美方拒絕送交在阿富汗逮捕的疆獨分子一事，也大表不滿。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美軍 2001 年 10 月在阿富汗發動的反恐戰爭，打散了疆獨在阿富汗的基地，使中共免於遭受疆獨突襲的困擾。美軍不但擊斃 20 餘名、逮捕 300 位疆獨分子，並迫使約 1000 名疆獨殘餘分子逃往巴基斯坦北部與阿富汗交界地帶。不過，美國至今沒有交付中共任何一名被俘的分離主義分子。《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5 月 29 日，第 11 版。

⁷ 《聯合報》，民國 91 年 1 月 16 日，第 13 版。

⁸ 林利民，「國際地緣戰略形勢與中國的選擇」，《現代國際關係》，2002 年第 3 期，頁 30-31。